

# 从鲁迅到巴金

Cong Luxun Dao Bajin

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录

陈思和 著

中西書局

· 013045193

C52  
256

# 从鲁迅到巴金

Cong Luxun Dao Bajin

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录



陈思和 著



C52  
256



中西書局

01304218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鲁迅到巴金：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录 / 陈思和著.  
—上海：中西书局，2013.3  
ISBN 978-7-5475-0413-0

I. ①从…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3741 号

---

---

---

# 从鲁迅到巴金：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录

陈思和 著

---

责任编辑 张安庆 赵明怡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 (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413-0/C·005

定 价 28.00 元

---

---

# 序：关于演讲

中西书局的编辑编了我的一本演讲录，书稿在我的案头放了一个多月，因为忙于其他刻不容缓的事情，直到今天我才开始阅读。但翻了几页又放下了，心里翻腾着一些想法，决定把它先写下来。

我是一个有了三十年教龄的大学教师，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上课教学（包括学术讲座）、参加学术会议交流研究心得以及参与各种社会讲座。当然还有其他的工作，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主要的工作离不开一个字——“传”。什么意思呢？就是传播，传播学科知识、学术心得和人生态度。

先说传播学科知识。这是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大学教学不同于中学教学之处，就在于它含有学科的性质，不是一般的普及基础知识。学科代表了某一类学术方向的价值取向，它不仅是分类也是一种系统，它可以把学术研究中的某一类知识系统化，设定明确的研究目标，把它推进到为社会服务的最佳处。学科知识包含了对某一研究方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通盘的理解和认识，并思考如何在现实中发挥最大的影响。中学里的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都是不带科研性质的，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基础知识的普及；而在大学教学中任何一门学科都带有研究性质，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教给学生基础知识，而

且要帮助学生投身于这门学科领域,一起来思考有关学术的问题,如何研究,如何解决,等等。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学,宗旨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想象的自觉和能力。因此,大学教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是要帮助他们在学习中不断肃清头脑里各种中学时代留下的应试教育遗毒,帮助他们拆除头脑里各种求知过程中留下来的条条框框,要通过学科知识的教学把学生们引进一个无禁忌的思想解放空间,激发起他们的学科热忱和献身精神。在今天,大学教育是一般非专业人士的最后一段接受教育的生涯,是帮助受教育者选择人生取向的关键阶段。一门专业课上得好,有可能就激发学生投身于学术的热情,就能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而一门课上得平平庸庸,其结果就是让学生厌恶、拒绝这个专业,向这个专业关闭了兴趣的大门。因此,如何“传”的问题,永远是大学教学的主要问题。

其次是传播学术心得。当然是指传播学科专业的研究心得,除了发表学术论文以外,有条件的话,各种学术会议是直接地与学者交流心得的最好场所。这里指的是一些认真严肃的专业会议,而不是目前国内外泛滥成灾的学术旅游活动。我的理想中的学术会议,应该是先确定一些新的学术成果(新发现、新思想、新见解、新命题),然后邀请专业的或者跨专业的专家前来围绕这些成果进行对话、讨论、质疑,检验这些新成果能否经得住科学的挑剔和批评。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是在你决定是否参加这个会议之前,首先要看它有没有提供新的学术成果及其价值意义,同时还应考虑的是,你有没有回应新成果的兴趣和能力。在新成果初期展示及其对话可能性的关系中,“传”的意义就进了一层,它不是课堂里授课那样由教师“传”向

学生，而是建构起一种平等讨论的对话关系，双向的“传”与“播”——即新成果展示以及得到的反馈。

其三，最后一种工作形态：社会服务，即大学教授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校园里面对学生传播知识，还有一种功能是面对社会市民，在某些公益性的、或者行业性的系统里举办讲座，在现代传媒技术发达的环境下，这种公众性质的讲座还可能以电视课堂形式来体现。这不是专业的学术讲座，面对的是大量非专业的受众；但也不是一般的普及知识，因为完全不关心这个主题、或者连一点基础知识也不具备的受众不会参加这样的讲座。换句话说，对于某些主题有一定兴趣、但又不深入理解的受众，是参加社会讲座的大多数。于是，这场讲座是否成功，就往往不在于学术性强或者理论创新，也不仅在于演讲者耍嘴皮子的能力——如“海派清口”只是娱乐而不是学术讲座，两者应有严格区别——我们在讨论这一类公共讲座是否成功时，必须要强调“传”的特殊功能：首先是一种演讲技巧在起作用，即演讲者能否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受众们关心的专业问题讲清楚，但这还是表象的，受众身份里很少有真正的粉丝，当人们从各行各业走进会场，面对一个陌生的大学教授听他的讲座，他们真正企盼着什么呢？我以为他们这种接受教育的目的相当宽泛，期待也相当隐晦，甚至是无意识的，很可能这场演讲的主题并非是他真正关心的目标，而他需要的是，你在演讲过程中的某一个观点对他有所启发，有所觉悟，帮助他来思考他自己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演讲者提出要求了，面对专业外的陌生的受众，你所要“传”的不止于专业题目，更重要的是，在预设的主题的背后，还有演讲者的人生态度——只有在更为广泛的人生态度的传播中，演讲者才能使自己的专业顺利转换为受众

所能够了解的知识,并且引起共鸣。随着媒体节目的进一步开放,会有大量的座谈、访谈、对话类的节目邀请大学教授发表见解,可能人生态度的权重还会进一步地扩大。

虽然我把传播学科知识、学术心得以及人生态度分作三种形式和三种对象,但是说到大学教师之“传”的本意,三者也是统一的。我一向反对大学教师在课堂上人云亦云,照搬教材,传播一些连自己也不怎么相信的所谓“知识”,或者不是真诚地把自己的人生想法告诉学生。我是提倡教师要努力将学科前沿的成果介绍给学生,学生走进大学的课堂,不是单单追求学科知识,他本身是带着各种人生问题、人生迷茫来学习的,一个好的老师不必包罗万象地解决学生所有的人生问题,但是在学科知识的教学中,如果有开阔的视界和真诚的态度,他在课堂上传播学科知识的本身,也包含了个人的学术研究心得以及人生的态度;相同的是,当我们在社会讲座上传播人生态度时,也同样离不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大学教师走上社会讲台之所以能够取信于民,就是因为他有专业知识;而学者经常发表研究心得,是对学科知识的提升,也是对教学品质的提升。三者功能不能截然分开。上课(包括讲学)、报告(发表成果)以及社会大讲堂上的讲座,统称起来都可以算作“演讲”。大学教师发表演讲是本职工作,课堂上演讲就是教学,会场上演讲就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而站在社会讲坛上演讲,就是一种含有专业背景的人生“布道”。教学、科研和服务,正是大学教师三位一体的岗位所在、责任所在。所以,我三十年来从未放弃过三者合一的追求目标。我的大部分的生命历程,都是在这样的工作中度过的。

我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过一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基本上是根据我的讲课录音整理出来的,其他部分都没有好好整理过。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讲义,除了有一部分编入我主编的、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文学史教材和专著外,没有完整地出版过自己的课堂讲义,倒是在我的学生那里,可能保存了各种版本的原始的讲课录音。其次就是各种场合的演讲稿。我的习惯是有了一个研究课题以后,总是把我的有关研究心得在各种演讲里表述出来,慢慢地听取反馈的意见,逐步完善我的研究课题。等到课题完成,就作为正式论文发表了。但演讲稿与学术论文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演讲稿没有等到正式成文就被整理发表了;或者相反,我已经写完了研究论文并且发表了,后来又拿这个题目去演讲,又有人根据录音整理了一份演讲稿,并且发表出来。这两种情况都造成了同样一个题目竟有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文本。现在收录在这个集子里,都是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的文本。至于学术会议发表的学术心得,一般都是经过加工修订以后作为正式论文发表,在此不计。

陈思和

2012年5月6日写于鱼焦了斋



# 目 录

## 第一辑 我的探索

我往何处去 / 3

从鲁迅到巴金：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及传承 / 20

人文教育的位置 / 28

真正的“五四”精神与教育的理想主义 / 37

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 / 44

当代文化趋向与出版对策 / 68

## 第二辑 我的阅读

纪念雨果 / 83

巴金《家》解读 / 99

曹禺《雷雨》解读 / 120

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 133

试论陈映真的创作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 167

现代散文创作中的谈“吃”传统 / 194

新世纪以来大陆长篇小说创作状况 / 205

当代短篇小说的阅读 / 224

附录一

附录二

01 文学史文选升世例前部形者 金巴恒那那入

85 文学史文选升世例前部形者

16 文学史文选升世例前部形者

14 文学史文选升世例前部形者

30 文学史文选升世例前部形者

附录三

08 附录三



---

# 第一辑

## 我的探索

---





# 我往何处去

近年来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的焦灼心理。我想这种“寻找”是有意义的，知识分子只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和依据的知识背景，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劳动成为一种自觉的劳动，共同建构起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传统。

写下这个题目，我首先想起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一部小说，中文译名是《你往何处去》。说的是古代罗马暴君尼禄屠城迫害基督徒，使徒彼得惶惶走在逃亡路上，遇到基督迎面而来，对他说：“你把我的人民丢在罗马城里不管，我只好自己去罗马，让他们再把我钉上十字架一回。”彼得大悟，于是返回罗马，为受难的基督徒祈祷，最后也被钉上了十字架。<sup>①</sup>我想彼得在基督门徒中算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这在《圣经》里也有透露。所谓“基督君临”的幻觉正表现了他在亡命期间的内心斗争，是救世责任要紧还是个人生存要紧？

---

<sup>①</sup> 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有多个中译本，这里依据韩侍桁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这个问题困扰了彼得。不过彼得到底是基督的高足，他终于重进罗马，用自己的血殉了自己的信仰。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兴盛，甚至统治了一部分人类的精神王国。所以，“你往何处去”与“重进罗马”精神联系在一起，成了一句激励人们勇敢地走向绝境、走向十字架殉道的名言。但是在今天，这个口号可能很不受欢迎，虽然它来自宗教，却更像启蒙主义者的口气，有人会提出质问：现在谁能担当基督的角色？谁能指点别人“往何处去”？知识分子的启蒙时代已经过去，还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所以，我只能取这句话的反意而用之，讲讲“我往何处去”，就像中国旧戏里一句流行唱词：自己的命自己算。由自己的处境，来谈谈知识分子在当代的文化认同。

## 人文精神寻思

我之所以有认同的自觉，是鉴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层面：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较为深刻的转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来设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文社会学科发生了相应的分化。<sup>①</sup>有些学科迅速靠拢市场需要，其研究人员大抵能在商品实现过程中直接分得一部分剩余价值，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以及

---

<sup>①</sup>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酝酿了许多年，1992年上半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是在上海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平心而论，本文所展示的文化危机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寻思”等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直接带来的后果，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体制转型首先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使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掩盖的负面精神现象一下子爆发出来。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也相对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态度，使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成为可能。

与决策部门相关的一些学科；也有些学科（主要是人文方面的学科）因为在市场经济运转中没有直接的可用性，顿时失落了其原有的社会价值，从事这些学科的研究教学人员无法在目前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经济上相对处于贫困化。这种分化以后，人文学科的内在价值受到怀疑。其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文学科是权力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在社会转型中已经渐渐变得不合时宜，趋于淘汰；二是人文学科自身的社会价值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得不到承认，新的“读书无用论”、轻视文化的粗鄙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许多从事人文学科工作的知识分子对专业的前景失去信心。更有甚者，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适应这样的社会转型，用虚无的态度来破坏本专业的内在道德规范，进而也破坏（用时髦的说法是解构）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理想和社会使命。这在一部分社会学科内部，表现为为了获得剩余价值的分配，用专业知识去维护社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腐败、黑暗现象和不义行为，而不是依据专业知识勇敢地与之作斗争；在一部分人文学科内部则表现为不断贬低、嘲笑知识分子的精英传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有人把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主张概括为“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全面抹平”的十六字诀。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市场经济的世俗文化认同，其更隐蔽的动机，则反映了人文社会学科正在向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演变。更为发人深省的是，当一部分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面临这样的文化困境企图自救，呼吁“人文精神寻思”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的声音那么微弱，理由那么不充足，几乎没有人能把这个可以意会却难以言状的“人文精神”解释清楚。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良知，这种说法虽嫌陈旧，仍不失为一种激励，但问题是知识分子凭什么才能成为“良知”，光凭大胆与口才，能否成为被社会承认的“良知”，或者说，知识

分子依据怎样一种知识背景在社会上发言？这就涉及到知识分子拥有怎样的知识结构，认同怎样的知识传统，进而与当代社会转型构成怎样一种关系。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构成知识分子梯队的大致有三个年龄层：70—80岁一代，60岁左右一代，40岁左右一代，每代之间的年龄相隔20岁左右，20—30岁一代年轻学者在学术上尚在生长，暂且不论。已经定型的三代学人之间，各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传统。若以15—30岁为人生求知阶段，那么现在70—80岁一代人的受教育期，基本上是在1930年代以后完成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传统知识结构以后的第一代受教育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学术专业化，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西方新学科，都建立起具体的学术专业，而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治学与经国济世的大业联系在一起，学术与庙堂文化浑然不分；二是这一代学人大都进过新型学校，或者留学国外，接受了世界文化的营养，即使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也都是世界化的，摆脱了传统治学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应该说这些特征在20世纪初中国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中已经一步步地确立，在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中表现得最为完整。后两代学人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主体力量，他们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现在60岁左右的一代学人，其求知阶段是1950—1960年代，当时新的政权刚刚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人文学科的改造，建构起一个革命乌托邦的理想图景，并借助教育和学术领域灌输给青年一代。从世界观而言，这一代人对乌托邦理想的认同取代了对前一代治学传统的继承，由1950年代共产风——1960年代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19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980年代四个现代化奔小康，逐渐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思路，以时代进步的信念制约自己的独立思



考,这样的前提使学术专业又沾染了庙堂文化的色彩,学术发展似乎又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回旋。现在 40 岁左右的一代则不同,他们的求知阶段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直到 1978 年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开始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泛滥的乌托邦理论深恶痛绝,他们在接受知识传统时往往跳过 1950 年代,朝更前的阶段追溯。198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正是老一代学者,他们在当时最积极的作用是将他们一代的知识传统、人格风范、价值取向等等直接传授给了年轻一代,使青年学人在知识背景上连接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现在 40 岁左右一代的学人,对 1950 年代以后的乌托邦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感情,制约他们理性思考的参照系,往往是老一代学者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同样面对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60 岁左右一代较典型的思路是把它与 1950 年代社会相比孰为优劣,而 40 岁左右一代人则更积极地从历史反省中去寻求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可能。<sup>①</sup> 这样,学术发展似乎又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回旋。

在以上的描述中,我使用了“新文化传统”这个词,更完整些说,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这是相对传统士大夫的旧文化传统而言,并不以“五四”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不是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专业知识,我是指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开创的价

---

<sup>①</sup> 举一个现成的例子,中国学术界讨论“人文精神寻思”时,有的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认为市场经济使人文精神失落了,那么,计划经济就能生出人文精神吗?你们是不是要恢复 1950 年代的理想主义?有意思的是,像这样的疑问在 40 岁以下 70 岁以上的人中间是不会发生的。就以最初提出“人文精神寻思”的几个学者来说,他们可能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并不一样,有的认为“人文精神”在明末清初顾炎武时代就失落了,有的认为是晚清以来逐步失去的,也有的参考了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道路,但不会有人怀恋 1950 年代的革命乌托邦,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不是从 1950 年代开始的,而那个时代的文化也不值得成为人类精神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所以,每一代人的知识传统不一样,对事物产生的联想、理解的方式也不一样。